

·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

张宇燕 冯维江

摘 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艰巨任务，亟须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理论提供分析框架和学术洞见。从厘定安全水平、安全能力和安全威胁关系的基本框架出发，可以得出七个理论命题，即绝对安全无法实现；为趋近绝对安全而不断增加安全投入，最终将陷入安全困境；封闭条件下，国家实现相对安全的努力应当止于均衡安全；开放条件下，霸权国可能生产出超过均衡安全的安全能力，并倾向于选择这样一些国家作为“保护”或掠夺对象；发展成果产出效率相对较高、安全能力产出效率相对较低；遵循不同技术路线分类处理有意安全威胁和无意安全威胁，比将两类威胁混合在一起处理，能达到更高的安全水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实现“大禹改进”，让来自其他行为体的有意安全威胁能力转变为防控共同的无意安全威胁的能力；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和加强国家系统安全投入，是应对不确定安全威胁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 安全能力 均衡安全 大禹改进

作者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引 言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提供了主体内容、严整逻辑和基本构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指引我国国家安全实践的重要思想。本文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综合已有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成果，利用经济学、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源，试构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以探索提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分析纲要。^①

^① 学科要素主要包括基本假定、核心概念、研究对象及范围、理论原理、特定问题、检验方法、本体论认识论定位及价值取向等。本文主要结合国家安全学学科特征，对其中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应该突出以下特点。第一，顺应并推动侧重研究外部威胁的“国际安全”向内外并重的“国家安全”回落的趋势。当代西方主流国家安全理论是在“冷战和外部侵略的威胁甚于萧条与社会变革的影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国际安全”获得了比“国家安全”更大的影响力。^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提出了在开放条件下统筹分析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要求。第二，倡导向“总体性”回归的理论视角。当代前沿的国家安全研究强调深入到议题或领域之中，寻找特定现象与因素之间的因果机制或相关关系，很少再提出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这样的“大理论”，也较少致力于将相互排斥的“大理论”整合到更加完整的“大一统”框架之中。基于此，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关注国家安全重点领域的同时，更应强调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在汲取已有国家安全理论养分基础上，致力于回到安全的基本假定和概念来构建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提倡基于较为完整的框架来研究纷繁复杂的议题和现象。

一、基本假定

本文遵循以下基本假定：

假定一，国家和其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博弈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博弈者种类繁多，包括国家、国际机构、社会组织、公司乃至个人等。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博弈者的个体理性未必能加总为集体理性。^②行为体企图通过竞争或合作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等客观条件的约束，加之各博弈者力量及运用力量的能力强弱不一，讨价还价过程存在权

亟须澄清的部分加以梳理。参见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页。我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从学科建设角度开始了对国家安全学的探索。一些学者从研究对象及重要领域出发，开展了对国家安全较为全面的论述，初步形成了国家安全学的理论体系。参见李少军：《国家安全理论初探》，《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2期；刘跃进：《建立“国家安全学”初探》，《国家安全通讯》1999年第1期；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问题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本文则主要从分析方法的角度，讨论国家安全学可以运用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应当指出，这些工具主要是帮助锚定、理解和分析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以及其发展背后的约束条件与演变逻辑，并非可直接用于安全治理的政策工具。

① 参见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② 参见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力不对称，行为体并非总能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①

假定二，安全是一种利益，是让其他具体利益得到保障从而免于损失威胁的元利益，安全利益是国家的第一需要。安全与利益密不可分。安全的基本前提是利益的存在。^② 其他条件相同时，利益越多，潜在的安全威胁也越大。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和实施安全战略的出发点，也是国家判断安全状态的主要标准。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总和。^③ 国家安全的根本着眼点就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其他重大利益。^④ “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⑤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⑥ 对国家等群体来说，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就成为最底层最基础的需求。

假定三，安全不是无成本或零代价的，支付成本来投资并生产安全能力时，一般遵循边际产出不变或下降的规律。一个没有非法暴力和寻租行为的社会未必是一个安全的社会，因为可能有大量的资源消耗在抑制暴力或其他寻租行为的行动或措施之上，而这与任由暴力或寻租行为消耗等量资源没有本质的不同。^⑦ 在判断安全程度时，应当将这部分抑制暴力或寻租行为的资源，作为安全的成本或代价一并计入安全的抵减项中。考虑安全成本后，进一步的假定是，其他条件不变时，在某一项产出安全能力的投资上的投入成本边际不变或递增，根据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的对偶性，这意味着投入的边际产出不变或下降。

假定四，世界范围内不存在可以裁断不同国家之间全部分歧或冲突的单一权威，换言之，不存在世界政府。国家间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几乎是所有学者的共识，

① 参见张宇燕、任琳：《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3期。

② 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或物质利益但不限于此，荣誉、价值观等非物质利益同样重要。抽象地讲，利益是被理性所驯化的欲望。例如，对金钱的欲望可被驯化为经济利益，对名声的欲望可被驯化为荣誉利益。被驯化后的利益又可进一步用来驯化或制约其他“野蛮”的欲望。参见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冯克利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39页。

③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6—47页。

④ 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利益。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第213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⑥ 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50, no. 4, 1943, pp. 370-396.

⑦ Francisco M. Gonzalez, "Effective Property Rights, Conflict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137, no. 1, 2007, pp. 127-139. 另可参见冯维江：《侠以武犯禁——

中国古代治理形态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8卷第2期。

并且是世界政治最独特、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特征之一。^① 在国家与其他治理主体之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可以像中央政府一样维持国际秩序。即使各行为体做出治理决策，也很难保证该决策得到贯彻执行并让违约行为受到惩罚。各种国际机构至多是在某些问题领域提供不同程度的协调。尽管在特定领域，权威或权力存在由高到低或由大到小的等级制特征，但是，不同领域中权威或权力等级排序并不一致，具备普遍或全领域意义的“最终裁判人”仍告阙如。

假定五，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广泛存在。信息不完备意味着行为体对自身（历史和现状）、决策环境或博弈论常用的“自然”的可能行动以及潜在的博弈对手的信息并不完全了解。现实中以上三个方面的信息不完备都存在。博弈分析中讨论最多的是博弈对手隐藏信息（逆向选择）或隐藏行动（道德风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中，隐藏信息是行为体掌握的关于自身能力和意愿等私人信息，不被其他博弈对手所知晓。隐藏行动是行为体采取的行动不为其他博弈对手所知晓。^② 国家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完备，特别是与其他国家或行为体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尤其严重，这也是国家安全威胁产生的重要原因。

二、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是支撑理论大厦的关键构件。新时代国家安全学首先需要界定的是安全及相关概念。已有研究对安全的界定各不相同。一些研究倾向于从传统安全的角度来定义安全。例如，认为安全是“免于战争的相对自由……对于在任何战争中都能立于不败之地抱有较高的预期”，^③ 或者“抵御国外侵略的能力”。^④ 另一些研究则强调从以国家为中心、聚焦军事的传统安全范式中漂离（shift away）出来，把安全涵盖的领域扩展到气候变化、资源匮乏、传染病、自然灾害、非法移民、食物短缺、贩卖人口、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乃至价值观冲突等更加广泛的非传统范围之内。^⑤ 例如，认为安全是“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或者“从客观上说，安全指的是不存在对已获得的价值观的威胁；从主观上说，指的是不必担心这种价值观受

① 参见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② 参见帕特里克·博尔顿、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合同理论》，费方域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③ Ian Bellamy, “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tical Studies*, vol. 29, no. 1, 1981, pp. 100-105.

④ Giacomo Luciani, “The Economic Content of Security,”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8, no. 2, 1988, pp. 151-173.

⑤ 参见梅里·卡巴莱诺-安东尼编著：《非传统安全研究导论》，余潇枫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6页。

到攻击”等。^① 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把安全和威胁相联系。本文从这一共性出发定义安全，进而由此扩展并逐一界定其他核心概念。

（一）安全：状态、能力和投入

根据假定二，安全是一种先于其他具体利益的元利益。这种元利益，主要体现在使各种具体利益得到保障从而能够免于遭受相应损失的威胁。具备这种利益的状态即为安全状态，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即为安全能力。换言之，安全就是行为体的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② 更正式的定义如下：

$$S = \frac{A}{T} \quad (1)$$

式（1）中，A表示行为体的安全能力（ $A \geq 0$ ），用可以有效处理的威胁（利益损失）规模来表示；T表示行为体面临的威胁的规模（ $T > 0$ ）；S即安全的状态， $S \geq 0$ 。当 $S = 0$ 时，行为体处于极端不安全状态；如果 $S \geq 1$ ，则行为体的利益处于完全有保障的安全状态； $0 < S < 1$ 时，安全水平随着S值的上升而提升。与安全能力相关的是安全投入I（ $I \geq 0$ ）。安全投入I未必直接或线性地体现为安全能力A，其与A的关系如下：

$$A = f(I) \quad (2)$$

式（2）具有以下属性。首先，式（2）为有界函数，这意味着安全投入能够产生的安全能力存在上限。其次，根据假定三，安全投入形成的安全能力边际不变或递减，这意味着A对I的二阶导数不为正，即 $\frac{d^2 A}{dI^2} \leq 0$ 。最后，式（2）A与I的关系存在三种情况。一是 $\frac{dA}{dI} > 0$ ，此时安全投入越大，行为体可以有效处理的威胁规模或安全能力越大；二是 $\frac{dA}{dI} = 0$ ，此时安全能力与安全投入无关，增加或减少安全投入，安全能力不变；三是 $\frac{dA}{dI} < 0$ ，此时安全能力与安全投入负相关，投入出现了“拥挤”或规模不经济现象，随着安全投入上升安全能力不升反降。

①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 150.

② 本文关于安全的定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定义国家安全之安全的含义保持一致。该法第二条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页）

为进一步厘清安全能力 A 和安全投入 I 的关系，可以引入安全能力投入弹性 ϵ ，有：

$$\epsilon = \frac{I}{A} \frac{dA}{dI} \quad (3)$$

由 (3) 可知， ϵ 反映了安全投入的百分比变动带来的安全能力的百分比变动。当 $\epsilon > 1$ 时，安全投入增加 1% 所带来的安全能力的增加幅度大于 1%，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这类安全投入不仅直接针对某一特定领域的安全威胁可提升处理能力，而且还具有“外溢性”，其提升的安全能力可以对更加广泛的威胁予以全系统的有效处理。在此，将符合 $\epsilon > 1$ 条件的安全投入 I 定义为系统安全投入 BI 。

(二) 积极安全、消极安全和安全困境

由 (1) 和 (2) 易知，安全状态 S 和安全投入 I 也存在三种情况：

$$\text{当 } \frac{dA}{dI} > 0 \text{ 时有: } \quad \frac{dS}{dI} = \frac{1}{T} \frac{dA}{dI} > 0 \quad (4)$$

式 (4) 定义了积极安全，即通过主动作为的安全投入改善安全状态而实现的安全。积极安全是一种较为普通的情形，安全投入对国内外的暴力或寻租行为形成了有效震慑，但又没有严重拖累经济社会发展。随着安全投入的增加，安全水平有所提升，安全状态得以优化。

$$\text{当 } \frac{dA}{dI} = 0 \text{ 时有: } \quad \frac{dS}{dI} = \frac{1}{T} \frac{dA}{dI} = 0 \quad (5)$$

式 (5) 定义了消极安全，即不进行新的安全投入甚至降低安全投入的情况下安全状态能够维持既定水平不变所实现的安全。在此状态下，各国无须进行安全投入，就能够维持稳定。或者说，增加或减少安全投资，都不影响安全水平。消极安全是中国人不断追寻的理想，史书中把这个状态叫作“泰平”。^① 和平可能是在对峙的情况下实现的，此时社会资源被大量配置于引而未发的“大炮”之上。“泰平”则不同，社会储蓄可以主要以余粮或“黄油”的形式存在，资源被配置到改善民生、促进生产而非加强战备的用途上——因为增加或降低安全投入都基本不会影响已有的安全水平。这需要主要国家之间对彼此都坚持和平道路存在高度的信任，或者有可置信的机制来保障建设性的、生产性的合作，表现为一种有韧性的安全。所谓由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在安全意义上就是，世界由主

^① 《汉书·食货志第四上》称，“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3页）

动作为的积极安全状态，向韧性强劲的消极安全状态方向不断前进。^①

本文对积极安全和消极安全的界定，与以赛亚·柏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区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旨趣相近。在柏林那里，前者指可以主动作为的自由，后者指免于干涉的自由。^②但这一区分与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中的积极和平及消极和平的概念旨趣正好相反。消极和平主要指“避免战争”，而积极和平则扩展到以“人类社会一体化”为目标的更加广泛的议题领域。^③在和平研究中，积极和平是更加“高级”的目标。本文中，消极安全是比积极安全更难实现的“高级”状态。一般说来，主动作为的安全模式投入或代价比较高，而通过良好的治理和信任构建，提升自身损失吸收能力和抗打击能力，增强安全韧性，这样实现的安全成本相对较低。现实世界中，消极安全作为一种状态很难持续存在，其存续需要满足“极高的内外部信任水平”等非常严格的条件，所以，往往是积极安全阶段之后直接进入安全困境，表现为图1中表示消极安全的线段收缩为一个点。

安全状态 S 和安全投入 I 关系的第三种情况是：

$$\text{当 } \frac{dA}{dI} < 0 \text{ 时有: } \quad \frac{dS}{dI} = \frac{1}{T} \frac{dA}{dI} < 0 \quad (6)$$

式（6）定义了安全困境，即安全投入增加但安全水平不升反降的状况。^④现有研究主要是在国际层面讨论安全困境，即一国追求安全或权力的投入，引发了其他国家竞相增加安全方面的投入，最终各国的安全投入增加了，但总体安全形势却恶化了（如军备竞赛）。实际上，安全困境不仅在国家间存在，国内同样可能出现。国内层面安全困境的一种逻辑是，安全投入挤占了生产性用途的投入，造成总产出下降，从而一方面降低了安全投入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使掠夺而非生产成为更具经

① 唐世平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有比较清晰的讨论，指出前者认为安全只有在“霸权稳定”下才存在，后者认为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可以实现安全。在“霸权稳定”状态下，安全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可能降低安全成本。参见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② 参见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89、200页。

③ 鉴于和平和安全含义有所不同，而本文已经明确定义了积极安全和消极安全，不会造成其与积极和平和消极和平的混淆。本文宁可保持与和平研究旨趣上的差异，来维护自身逻辑的清晰性和一致性。参见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128页。

④ 唐世平对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有非常详细的分析，但他界定的安全困境特别强调行为体主观上缺乏“恶意”，从而认为只有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才存在安全困境。本研究把安全困境这个概念由国际安全分析层次向国内安全分析层次拓展，不考虑难以测量且容易变化的行为体的主观意图。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只要提升安全投入造成安全水平不升反降的现象，都属于本文定义的安全困境。参见唐世平：《防御性现实主义：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林民旺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4—65页。

济理性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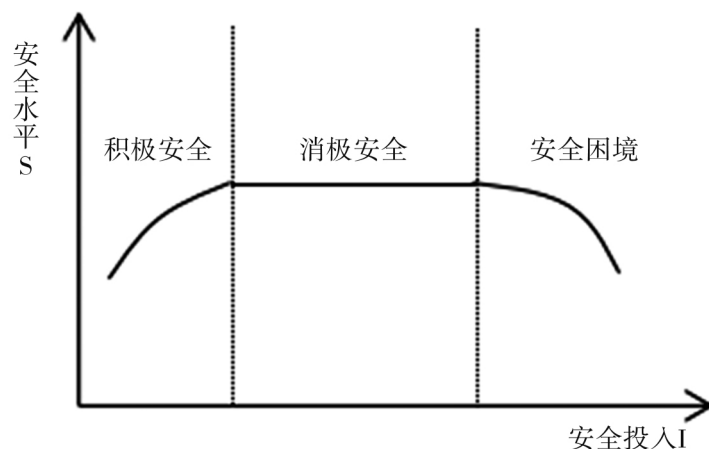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安全状况的示意图

(三) 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

根据假定五，式（1）中行为体面临的安全威胁 T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确定的或至少知晓预期损失发生概率及预期损失的威胁 T_c （简称确定的威胁 T_c ），其二是不确定的威胁 T_u 。不确定威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威胁，比如触发一场危机的偶然或随机因素，或者超出人类经验范围、感知阈限的威胁性因素，行为者对此完全缺乏信息。第二类是“确定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威胁，人们对威胁来源有一定的认识，但信息并不充分，要么不知其发生的概率多高，要么不知其潜在的破坏性多大。两类威胁共同构成 T_u 。有 $T = T_c + T_u$ 。代入式（1）得到：

$$S = \frac{A}{T_c + T_u} \quad (7)$$

前文表明，当 $S \geq 1$ 时，行为体的利益处于完全有保障（免于威胁）的安全状态，此时的 S 定义为绝对安全。将应对确定威胁 T_c 而实现的安全状态标记为 S_c ，当 A 能够完全覆盖确定的威胁 T_c 并且还有一定的安全冗余 G_a 来应对不确定的威胁 T_u 时，有：

$$S_c = \frac{A}{T_c} > 1 \quad (8)$$

$$G_a = A - T_c > 0 \quad (9)$$

将满足式（8）条件的 S_c 定义为相对安全。

从政策取向上看，相对安全和绝对安全的划分，是从安全的目标或规范意义上何为理想安全状态的角度展开的。其中，相对安全的内在含义是，追求有限度的、具备局部优势的能力和有限的安全冗余 G_a 所保障的安全状态。换言之，相对安全并不追求完全清除内外潜在威胁甚或以压倒性威胁他者的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方

式来实现自身安全。绝对安全则不然。追求绝对安全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全面且无限扩大自身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力量优势，来试图消除所有的不确定的威胁，确保自身处于不受威胁或免于危险的状态。换言之，绝对安全追求者可能以安全理由无限放大不确定威胁 T_u 的规模，从而为肆意提升安全能力 A 提供理由。

(四) 无意安全和有意安全

确定的威胁 T_c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缺陷等风险源造成的威胁 T_{ca} 。另一类是带有主观胁迫或侵害意图的威胁 T_{ce} 。^① 有 $T_c = T_{ca} + T_{ce}$ ，由式 (8) 可得：

$$S_c = \frac{A}{T_{ca} + T_{ce}} \tag{10}$$

与 T_{ca} 威胁相联系的安全定义为无意安全 S_{ca} ，与 T_{ce} 威胁相联系的安全定义为有意安全 S_{ce} 。当 $T_{ce} = 0$ 时，不存在带有主观意图的威胁而只有客观风险源造成的威胁 T_{ca} ，此时无意安全 S_{ca} 有：

$$S_{ca} = \frac{A}{T_{ca}} \tag{11}$$

当 $T_{ca} = 0$ 时，不存在客观风险源造成的威胁而只需要处理带有主观意图的威胁 T_{ce} ，此时有意安全 S_{ce} 有：

$$S_{ce} = \frac{A}{T_{ce}} \tag{12}$$

主观威胁 T_{ce} 的大小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威胁意图或意志的强烈程度 β 。 β 取值在 0 到 1 之间。当 $\beta = 0$ 时，潜在威胁源没有威胁意图，实施威胁的概率为 0；当 $\beta = 1$ 时，潜在威胁源实施威胁的概率为 100%。第二个因素是潜在威胁源的威胁能力，或威胁（造成利益损失）规模 T_{CE} ，即 $T_{ce} = \beta T_{CE}$ 。由此，(12) 式可以写成：

$$S_{ce} = \frac{A}{\beta T_{CE}} \tag{13}$$

英文里与安全对应的单词主要有 security 和 safety。这两个含义的安全是按威胁来源属性的不同划分的，security 意义上的安全对应于有意安全 S_{ce} ，safety 意义上的安全对应于无意安全 S_{ca} 。如前所述，有意安全举措一般处理人为或有意的破坏或

① 已有研究更多将威胁分为传统的和非传统的，由此引申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前者主要指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安全，涉及的安全行为体主要是国家；后者则包括范围广泛的其他安全领域，涉及的行为体更为多元且更强调“人的安全”。按传统或非传统的标准划分安全威胁，有助于深入理解安全威胁的性质。本文提出的分类标准并不排斥已有标准，并且可以在传统或非传统安全威胁中进一步区分带有或不带有主观损害意图的威胁，从而增强应对处置相关安全威胁的可操作性。

安全事件（这类事件所带来的威胁通常是某一或某类博弈方仅顾自身利益而对其他博弈者带来的威胁），无意安全举措一般处理非人为或无意造成的事故或安全风险（这类事件或风险所带来的威胁往往是所有博弈方都想避免但又难以完全避免的威胁）。中文“安全”一词涵盖了有意安全和无意安全两重含义，可以对应于 safecurity。不过很多情况下，主观威胁和客观威胁同时存在且相互交织，式（10）可改写成：

$$S_c = \frac{A}{T_{ca} + \beta T_{CE}} \quad (14)$$

考虑上面影响安全的全部因素，可以得到关于安全的综合表达式：

$$S = \frac{f(I)}{T_{ca} + \beta T_{CE} + T_u} \quad (15)$$

由式（15）可知，其他条件不变时，在积极安全状态下增加安全投入 I ，降低不确定威胁 T_u ，减少客观威胁 T_{ca} ，降低潜在对手的威胁意愿 β 或威胁能力 T_{CE} ，都可以改善安全状态或提升安全水平。

（五）均衡安全

当威胁程度为确定的 T_c 时，行为体开展 I 的安全投入可以产生 $A=f(I)$ 的安全能力，该能力可以确保规模为 A 的利益。假定行为体拥有的资源为 Y ，其中 δ 的比例（ $0 \leq \delta \leq 1$ ）作为安全投入，有 $I=\delta Y$ ，产生的安全能力 $A=f(\delta Y)$ 。剩余 $1-\delta$ 的比例作为发展投入，产生的发展成果 $D=g[(1-\delta)Y]$ ， $g(\cdot)$ 为发展成果生产函数。为简化分析过程，令安全或发展的投入与成果产出线性正相关，这意味着行为体处于可以按投入程度等比例提升安全水平的积极安全状态。将发展成果产出曲线置于安全能力产出曲线的坐标系中，则发展成果产出函数可改写为 $D=g(Y) - g(\delta Y)$ ，其中 $g(Y)$ 是当全部资源投入发展时（此时 $\delta=0$ ， $g(\delta Y)=0$ ）能够产出的最大成果。

在安全能力产出曲线的坐标系中，当 $A>D$ 时，安全能力能够保护的利益规模大于发展成果，此时理性行为体会增加发展投入；当 $A<D$ 时，安全能力能够保护的利益规模小于发展成果，超出保护能力范围的发展成果会损失掉，此时理性行为体会致力于提升安全能力而宁可减少发展投入；当 $A=D$ 时，行为体安全能力所能保护的利益与其所产出的发展成果相当，此时的安全水平为均衡安全。有：

$$f(\delta Y) = g(Y) - g(\delta Y) \quad (16)$$

式（16）整理后可得：

$$f(\delta Y) + g(\delta Y) = g(Y) \quad (17)$$

由于 Y 是常量，令 $F(\delta) = f(\delta Y) + g(\delta Y)$ ，此时有：

$$F(\delta) = g(Y) \quad (18)$$

令 $y=F^{-1}(x)$ 为 $y=F(x)$ 的逆函数，可得：

$$\delta = F^{-1} [g(Y)] \quad (19)$$

由此，均衡安全水平下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产出为：

$$D = f(YF^{-1}[g(Y)]) = g(Y) - g(YF^{-1}[g(Y)]) = A \quad (20)$$

此时的均衡安全水平为：

$$S_c = \frac{g(Y) - g(YF^{-1}[g(Y)])}{T_c} = \frac{f(YF^{-1}[g(Y)])}{T_c} \quad (21)$$

三、理论命题

根据前述基本假定，运用前面界定的核心概念，本文提出并初步论证国家安全学领域的以下理论命题。

命题一：绝对安全无法实现。

由式(7)可知，实现绝对安全的条件是 $S \geq 1$ ，即 $A \geq T = T_c + T_u$ 。当确定的威胁 T_c 存在时，这意味着对任意不确定威胁 T_u ，有 $A > T_u$ 恒成立。但是，由于 $A = f(I)$ 是有界函数， $I = \delta Y$ ，而国家可以使用的资源 Y 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安全投入 I 在有限的定义域上产生的安全能力 A 存在上限 \bar{A} 。当 T_u 取大于 \bar{A} 的值时， $A > T_u$ 不能成立，即绝对安全条件不能满足。

尽管从理论上讲，绝对安全是不可达至的，^① 甚至当不确定威胁 T_u 存在时，安全能否有明确刻画其程度的指标都是有争议的，^② 但并不妨碍一些决策者将寻求绝对安全作为政策目标。例如，有人认为，“9·11”事件之后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采取的以单边主义和预防性战争的战略理路为关键要素的政策逻辑就是在追求绝对安全。^③

关于作为目标的安全状态的相对性和反对绝对安全，中国方面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明确指出，“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④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

① Baldwin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在本文中得到了形式化的证明。参见 David A.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1, 1997, pp. 5-26.

② 比如布赞就指出，如果把安全视作一个目标，这样的绝对安全遥不可及、不可能实现，如果视为一系列相对的状态，那么就会引出一个复杂并且客观上无解的问题，即何种程度的安全才算够？参见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健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16—317页。

③ David C. Hendrickson, “Toward Universal Empire: The Dangerous 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9, no. 3, 2002, pp. 1-2.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54页。

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①

如果国家以应对包括不确定威胁 T_u 在内的各种威胁为由，试图通过持续的安全投入来不断提升安全水平以“趋近”于绝对安全，这个过程往往最终会导致安全困境。于是有以下命题。

命题二：为趋近绝对安全而不断增加安全投入，最终将陷入安全困境。

由式（2）的性质可知，有 $\frac{d^2 A}{dI^2} \leq 0$ ，根据式（1），有 $\frac{d^2 S}{dI^2} = \frac{1}{T} \frac{d^2 A}{dI^2} \leq 0$ ，这意味着随着安全投入的增加，安全水平也是边际不变或递减的。结合式（4）（5）（6）可知，在经过积极安全、消极安全阶段（如前所述，现实中消极安全阶段往往收缩为一个点而不能持续存在）之后，继续增加安全投入可能进入安全水平不升反降的安全困境（见图1）。就一国自身而言，这种安全水平的不升反降主要是源自安全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减。当存在潜在对手国或面临有意安全问题时，陷入安全困境的进程可能加快。

从对外政策的行动逻辑来看，一国（假定为“霸权国”）的安全状态要趋近绝对安全至少需要全方位、大幅度扩大本国与其他国家（假定为“潜在对手国”）的安全力量差距，使得其他国家无法对本国的利益形成有效的威胁。要做到这一点，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无非从三个方向进行努力。一是霸权国全面并大幅提升本国安全能力 A 。二是大幅削弱潜在对手国的威胁能力 T_{CE} 。三是可置信地削弱潜在对手国对本国的威胁意志或意愿 β 。但第一个方向和后面两个方向可能存在矛盾。潜在对手国看到霸权国加大安全投入 I 以提升安全能力 A 的行为，由于假定四，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为各国的安全投入作出有约束力和可置信的安排，潜在对手国出于安全优势被削弱或受到的威胁加大的担忧也会增加本国的安全投入来提升安全能力，而这加剧了霸权国面临的威胁 T ，这一威胁增长的幅度可能大于霸权国安全能力 A 提升的幅度，这样就会让提升霸权国安全能力的效果被抵消，由式（1）和式（15）可知，这将表现为安全水平 S 不升反降。上述情形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没有绝对安全，要立足基本国情保安全，避免不计成本追求绝对安全，那样不仅会背上沉重负担，甚至可能顾此失彼”，^② “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最终会贻害自己”。^③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3页。

②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49页。

实际上,霸权国要在增加自身安全能力的同时,大幅削弱潜在对手国的威胁能力 T_{CE} 是非常困难的。其一,根据假定五,与其他国家自己相比,霸权国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总是处于信息劣势。潜在对手国总是有机会隐藏自己某个方面的实力,或者发展出自己的非对称力量或“撒手锏”,可能产生颠覆性效果。其二,“全面大幅削减其他国家威胁能力”和“保持本国安全能力不变”可能存在冲突。削减潜在对手国的威胁能力,多需要消耗霸权国软硬实力,在此过程中,可能被第三国“渔翁得利”。霸权国削弱其他国家力量的努力或企图,还可能反而激发起其他国家的斗争意志和威胁意愿,让原本没有威胁意愿的国家转投敌对阵营,使力量对比发生巨变,造成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崩溃。这类安全困境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已经有较充分的讨论。正如基辛格所言,“一个大国对绝对安全的渴望,就意味着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①

即便不考虑安全困境和消极安全状态,仅在安全投入能够带来安全能力同向变化的积极安全阶段,一国的安全投入也并非越多越好,有以下命题。

命题三:封闭条件下,国家实现相对安全的努力应当止于均衡安全。

由于假定三,形成安全能力或实现并维持安全状态不是无成本或零代价的,这意味着实现安全必定会耗费资源。这部分为实现安全而投入的资源,原本投入于其他生产性用途所能够形成的产出中的最大值,就是安全投入的机会成本。

如式(16)所述,在图2中, OJ (以及 OJ^*)线表示一国的安全能力投入产出函数,即 $A=f(I)=f(\delta Y)$ 的曲线,其斜率是单位资源投入产生的安全能力,在积极安全阶段,其斜率为正。 PI 线表示该国的发展成果投入产出函数 $D=g((1-\delta)Y)$ 的曲线,其斜率是单位资源投入发展成果生产所能够产生的成果。 OP 代表该国全部可用资源 Y , OB (或 OA 、 OB^*)表示按一定比例投入安全能力生产的资源, BP (或 AP 、 B^*P)表示扣除安全投入之后其余的投向发展成果生产的资源。

当安全—生产的资源分配点位于 A 点时, OA 的安全投入产生了保障利益规模为 AC 的安全能力,相应地, AP 的发展投入产生了 AD 的利益。 OI (全部资源投入生产而获得的利益产出水平)减去 AD 的部分,就是把 OA 段资源投入安全而非生产所带来的安全机会成本。当安全—生产的资源分配点位于 A 点时,其中 CD 段的发展成果收益得不到保障。此时,社会处于安全投入不足的状态,可以增加安全投入。如果将安全投入增加到 OF ,发展投入则为 PF ,此时 OF 的安全投入可以保障规模高达 FH 的利益,但留给发展的生产性资源 PF 只能产生 FG 的利益,此时,社会处于安全投入过度的状态,应当削减安全投入。合理的安全投入规模是 OB ,

①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History, 1957, p. 2.

其产生的安全能力恰好能够保护 PB 的生产性投入所产生的利益 BE，此时的安全即为均衡安全。不妨设安全能力投入产出曲线斜率为 f' ，发展成果投入产出曲线斜率为 g' ，根据式 (17)，有：

$$BE = \frac{f'}{f' + g'} g(Y) = \frac{f' g' Y}{f' + g'} \quad (22)$$

此时国内用于安全的资源投入 OB 为 $\frac{g' Y}{f' + g'}$ ，用于发展的资源投入 PB 为 $\frac{f' Y}{f' + 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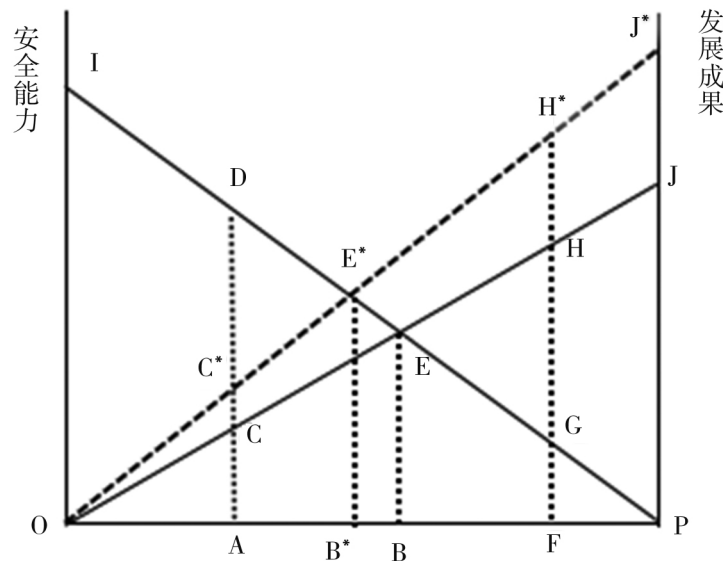


图 2 安全与发展的投入产出关系

由图 2 以及式 (22) 可以得出结论：其他条件不变时，无论提升 OJ 的斜率 f' ，还是提升 PI 的斜率 g' ，均衡安全状态下的产出都会提升。例如，当 OJ 斜率增加至 OJ* 时，尽管 PI 的斜率没有变化，均衡安全下的产出由 BE 增加至 B* E*。由此得出以下推论：

提升安全能力的投入产出效率或发展成果的投入产出效率，都可以增加均衡安全下的社会产出。

这一推论意味着，提升投入产出效率非常重要。无论是安全方面的还是发展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都可以让一国拥有充分安全保障的产出水平上升，而效率的提升通常需要科学技术或管理制度上的进步来实现。

在开放条件下，命题三可能不再成立。此时，一国安全能力可以向外溢出，选择“保护”或者掠夺其他国家。其行为规律遵循以下命题。

命题四：开放条件下，霸权国可能生产出超过均衡安全的安全能力，并倾向于选择这样一些国家作为“保护”或掠夺对象：发展成果产出效率相对较高、安全能力产出效率相对较低。

在同一个坐标系下，不妨令霸权国的安全能力投入产出函数和发展成果投入产

出函数分别为：

$$y = f_0' x \tag{23}$$

$$y = a_0 - g_0' x \tag{24}$$

其中 f_0' 和 g_0' 分别是安全产出曲线和发展产出曲线的斜率， a_0 是全部资源用于生产发展成果时的最大产值。

类似地，潜在对手国的安全能力投入产出函数和发展成果投入产出函数分别为：

$$y = f_1' x \tag{25}$$

$$y = a_1 - g_1' x \tag{26}$$

两国的安全及发展产出可用图 3 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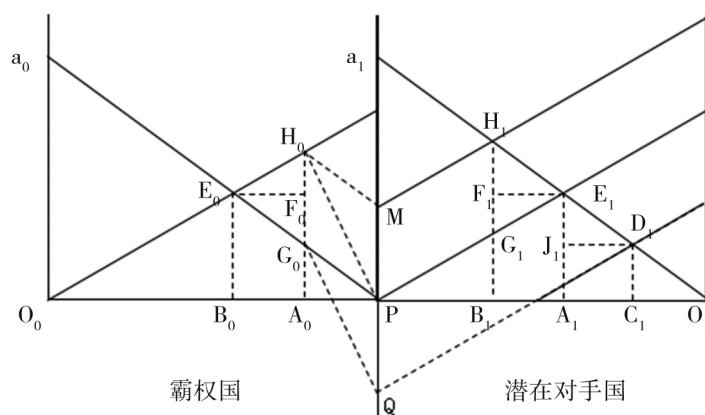


图 3 霸权国和潜在对手国的安全能力及发展成果产出示意图

由式 (23) 至 (26) 及图 3 可知， O_0H_0 为霸权国的安全产出曲线，斜率为 f_0' ， a_0P 为霸权国的发展产出曲线，斜率为 g_0' 。相应地， PE_1 为潜在对手国的安全产出曲线，斜率为 f_1' ， a_1O_1 为霸权国的发展产出曲线，斜率为 g_1' 。

前面已经证明，封闭条件下，霸权国在均衡安全点的产出为 B_0E_0 。开放条件下，霸权国可以用 O_0A_0 的资源来生产安全能力 A_0H_0 ，此时只有 A_0P 的资源用于生产 A_0G_0 的具备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本国生产的发展成果与均衡安全点相比减少了 G_0F_0 （即 $A_0F_0 - A_0G_0$ ）。同时，霸权国有 G_0H_0 的过剩安全能力可以向外溢出。

第一种溢出方式是霸权国把潜在对手国纳入自身安全保护范围之内，表现为将潜在对手国的安全产出曲线 PE_1 左移提升至 MH_1 ，此时潜在对手国国内均衡安全点的发展成果产出由 B_1F_1 （等于 A_1E_1 ）提升至 B_1H_1 ，增加了 F_1H_1 。

可以证明，当潜在对手国的安全产出曲线斜率和发展产出曲线斜率与霸权国相同时（ $f_0' = f_1'$ 且 $g_0' = g_1'$ ），换言之，两国在将资源转化为安全能力和发展成果的效率相当时，霸权国输出安全能力向潜在对手国提供安全保护造成的国内发展产出的减少 G_0F_0 ，正好与潜在对手国因接受安全保护、安全能力强化而增加的发展成果产出 F_1H_1 相当。

当潜在对手国的发展产出曲线斜率大于霸权国时 ($f_0' = f_1'$ 且 $g_0' < g_1'$)，潜在对手国接受安全保护而增加的国内产出 F_1H_1 将大于霸权国输出安全能力而蒙受的产出损失 G_0F_0 ，这意味着潜在对手国把霸权国因输出而蒙受的损失足额补偿之后，还有富余的产出可以在两国之间进行分配。在此情况下，两国可通过协议达成相对于霸权国不对外提供安全保护的初始状态的帕累托改进。

当潜在对手国的安全产出曲线斜率大于霸权国时 ($f_0' < f_1'$ 且 $g_0' = g_1'$)，潜在对手国接受安全保护而增加的国内产出 F_1H_1 将小于霸权国输出安全能力而蒙受的产出损失 G_0F_0 ，这意味着霸权国缩减本国产出而输出安全保护可能得不偿失。

第二种溢出方式是霸权国攻击或掠夺潜在对手国，表现为造成潜在对手国安全产出曲线 PE_1 右移下降至 QD_1 ，潜在对手国原本在均衡安全点生产的有保障的发展成果为 A_1E_1 ，由于安全产出曲线右移，其安全能力可以保障的发展成果缩小至 A_1J_1 （等于 C_1D_1 ），不能得到保障的部分 J_1E_1 部分被霸权国掠夺走。有 $J_1E_1 = F_1H_1$ ，即被掠夺的产出和因受到保护而增加的产出相当。类似地，可以证明当潜在对手国的发展产出曲线斜率大于霸权国时 ($f_0' = f_1'$ 且 $g_0' < g_1'$)，霸权国可以从潜在对手国掠夺的产出将大于霸权国因输出安全能力而蒙受的产出损失；当潜在对手国的安全产出曲线斜率大于霸权国时 ($f_0' < f_1'$ 且 $g_0' = g_1'$)，霸权国能掠夺到的产出将小于输出安全能力而蒙受的本国减产。

综上，无论是对外提供安全保护还是向外掠夺，霸权国以那些发展成果产出效率相对较高、安全能力产出效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为对象，都可能获得比封闭条件下本国在均衡安全点上生产之所得更多的成果或产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之俄罗斯、伊朗等国，中国、日本、韩国等更可能成为美国掠夺施压或提供安全保护（并收取保护费）的对象。^①

命题五：遵循不同技术路线分类处理有意安全威胁和无意安全威胁，比将两类威胁混合在一起处理，能达到更高的安全水平。

由命题四可知，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或风险可能是由于其他大国的安全能力溢出（表现为提供安全保护并收取保护费或直接的掠夺）而产生的，这类带有主观胁迫意图的威胁来源所产生的安全问题即公式（12）定义的有意安全问题。处理这类

① Joshua Shifrinson 的研究从“被溢出国”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安全能力溢出规律的理解。其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因为霸权国的安全能力溢出而抵消来自其他大国的威胁，该国将倾向于支持霸权国的安全溢出（接受保护），否则该国可能与霸权国对抗甚至反过来掠夺被认为处于衰落中的霸权国。这意味着，霸权国可能将一些发展产出效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塑造为共同威胁，以此促使另一些发展产出效率相对较高的国家接受其“保护”。参见 Joshua R. Itzkowitz Shifrinson, “Partnership or Predation? How Rising States Contend with Declining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5, no. 1, 2020, pp. 90-126.

问题，需要采取博弈论或基于斗争的技术路线，所采取的安全政策，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反应与各方的互动。这与处理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缺陷等风险源而产生的无意安全问题是有所区别的，后者由公式（11）所定义，处理时主要采取工程学的技术路线。

根据式（11）和（12），当安全能力为 A 时，分类处理两类威胁能够达到的安全水平为：

$$S_c = \frac{\theta A}{T_{ca}} + \frac{(1-\theta) A}{T_{ce}} \quad (27)$$

其中， $0 \leq \theta \leq 1$ ，表示全部安全能力中用于处理无意安全威胁的比例， $1-\theta$ 则是处理有意安全威胁的比例。混合处理无意安全威胁和有意安全威胁的安全水平由公式（10）决定。

不难证明，当无意安全威胁和有意安全威胁同时存在（即 $T_{ca} > 0$ 且 $T_{ce} > 0$ ）的条件下， $\frac{\theta A}{T_{ca}} + \frac{(1-\theta) A}{T_{ce}} > \frac{A}{T_{ca} + T_{ce}} \equiv \frac{\theta A}{T_{ca} + T_{ce}} + \frac{(1-\theta) A}{T_{ca} + T_{ce}}$ 恒成立。这意味着分类处理两类威胁所能达到的安全水平总是高于将两类威胁混合在一起处理所能达到的安全水平。

同一个领域可能同时存在无意安全威胁和有意安全威胁。例如，生物安全在英文中有 biosafety 和 biosecurity 两种表达方式。^① 前者对应的安全威胁是自然或意外发生的生物安全威胁，这属于无意安全的范畴，如传染病的流行，实验室里病原体的意外泄露等。后者对应的是人为或蓄意的生物攻击的威胁，这属于有意安全的范畴，如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有意图地使用或扩散生物武器。^②

金融安全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金融安全既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倡导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所要处理的流动性不足、债务过高等客观困难或麻烦有关的无意安全问题，也包括特定国家通过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冲击别国稳定或运用制裁手段限制他国金融主体运营等相关的有意安全问题。^③

① 参见王子灿：《Biosafety 与 Biosecurity：同一理论框架下的两个不同概念》，《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指出，民族国家和恐怖主义组织已经发现了追求生物武器的价值，并且我们对于未来这种情况能否有转机并不抱信心。生命科学的进步既可以降低对这种武器的技术门槛，也可以扩大具有相关技能的个人数量，从而形成威胁。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 (2018), September 8,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09/National-Biodefense-Strategy.pdf>, May 15, 2021.

③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42-79.

命题五的政策含义是，在处理安全威胁时，应尽量区分有意安全威胁和无意安全威胁，分类施策才更容易对症下药，从而达到更高的安全水平。

命题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实现“大禹改进”，让来自其他行为体的有意安全威胁能力转变为防控共同的无意安全威胁的能力，此时命运共同体之中达到的均衡安全产出水平，可能高于各国分别实现均衡安全的产出水平之和。

在公式（14）中， β 取值在0到1之间，反映的是有意安全威胁来源的威胁意图，当 β 取0时不存在威胁意图。国家间关系中，排除威胁意图相当于摆脱了“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敌”的霍布斯文化，进入了“互为竞争者”的洛克文化，但离“互为朋友”的康德文化还有距离。^①如果威胁别国的意图逆转共同为无意安全威胁的意图，则原来构成有意安全威胁的相关资源或能力，相应转换为共同促进普遍安全的能力，式（14）变为：

$$S_c = \frac{A + \alpha T_{CE}}{T_{ca}} \quad (28)$$

其中 α 取值在0到1之间，表示潜在的有意安全威胁转为安全合作伙伴而形成共同安全能力的意图。当 α 取0时表示没有形成共同安全能力的意图，当 α 取1时表示原来的威胁全部转为安全能力。这一安全威胁意图逆转安全合作意图的灵感来源是大禹“化干戈为玉帛”的事迹，故命名为“大禹改进”（Great Yu Improvement）。^②

逆转威胁意图或实现“大禹改进”，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重要。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出共同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③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安全共同体来看，^④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提出了在开放条件下（“开放包容”）统筹发展与

①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② 据《淮南子·原道训》记载，大禹之父鲧筑“三仞之城”来防范风险，结果陷入了安全投入增加而安全水平下降的安全困境（“以其役劳，故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猾之心也”）。大禹改其道而行之，在降低安全投入的同时增加物质及道德等方面的公益产品（public goods）供给（“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得到诸侯和四夷的认同和支持。原先背叛并武装抵制夏朝者，开始向其纳贡赋税（相当于共同负担包括安全投入在内的公益产品），夏朝在涂山会盟，诸侯和四夷纷纷执玉帛前来承认其盟主地位（“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42—44页。

③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37—549页。

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谈到了安全共同体、安全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例如，2020年11月10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2016年4月1日，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努力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参见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

安全（“共同繁荣”）、全面实现有意安全（“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和无意安全（“普遍安全”“清洁美丽”）的内在要求。某一区域或全体人类的有意安全威胁在逆转威胁意图之后，各国不仅不再构成彼此的安全威胁，而且还能形成共同应对无意安全威胁的能力，所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显著提升整体安全水平及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产出水平。^①

与命题四中的霸权国单方面溢出安全能力不同，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霸权国和由潜在对手转变而来的伙伴国达成了可以在两国内统筹配置发展和安全资源的共识。两国的安全能力产出函数和发展成果产出函数的形式仍然由式（23）至（26）描述。如图4所示，不妨令霸权国的安全能力曲线 O_0E_0 的斜率 f_0' 大于伙伴国安全能力曲线 PE_1 的斜率 f_1' ，伙伴国发展成果曲线 O_1E_1 比霸权国发展成果曲线 PE_0 更陡峭（即 $g_1' > g_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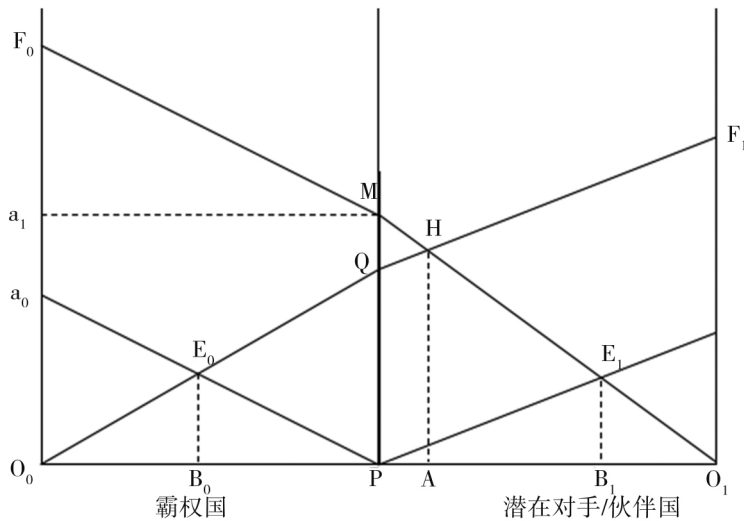


图4 人类命运共同体均衡安全产出示意图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两国统筹资源配置时，无论是安全还是发展用途的资源，配置时都会先选择更陡峭的曲线（配置效率更高）的路径，按此曲线适配全部产能后，才会选择沿着较不陡峭的曲线来配置剩余资源。当伙伴国全部投资于发展的产出 PM 大于霸权国全部投资于安全所可以保障的产出 PQ 时，由式（23）至（26），两国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后的均衡安全对应的有保障的发展产出 AH 满足以下表达式：

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1日，第2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第213页。

① 式（28）等号右侧表达式的分母未包括不确定的安全威胁 T_u ，因为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国有望经国际协调共同应对确定的无意安全威胁，而要对不确定的安全威胁开展有效协调，可能需要自身具备充分权威和更大资源配置合法性（及能力）的世界政府才能实现，而根据假定四，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AH = \frac{f_1' a_1 g_0' + f_0' a_0 g_1'}{g_0' (f_1' + g_1')} \quad (29)$$

两国未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国内均衡安全的有保障发展产出之和为：

$$B_0 E_0 + B_1 E_1 = \frac{f_0' a_0}{f_0' + g_0'} + \frac{f_1' a_1}{f_1' + g_1'} \quad (30)$$

可以证明 $\frac{f_1' a_1 g_0' + f_0' a_0 g_1'}{g_0' (f_1' + g_1')} > \frac{f_0' a_0}{f_0' + g_0'} + \frac{f_1' a_1}{f_1' + g_1'}$ 恒成立。

其他条件不变，当 PM 小于 PQ 时，AH 满足以下表达式：

$$AH = \frac{f_0' (a_0 + a_1)}{f_0' + g_0'} \quad (31)$$

可以证明 $\frac{f_0' (a_0 + a_1)}{f_0' + g_0'} > \frac{f_0' a_0}{f_0' + g_0'} + \frac{f_1' a_1}{f_1' + g_1'}$ 恒成立。这意味着 $AH > B_0 E_0 +$

$B_1 E_1$ 恒成立。也即，上述条件下，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后的均衡安全下的有保障发展成果产出，总是可以大于两国没达成命运共同体条件下，分别达成均衡安全时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产出之和。

命题七：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和加强国家系统安全投入，是应对不确定安全威胁的重要方式。

由命题一可知，由于不确定威胁的存在，绝对安全无法实现。由式（8）和式（9）可知，相对安全被定义为在覆盖全部确定威胁之外，还留有一定的安全能力冗余（ G_a ）来作为应对不确定威胁的准备，即 $G_a = A - T_c$ 。

安全能力冗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不确定威胁发生时可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平抑或控制其安全冲击，二是当不确定威胁发生后能够帮助受冲击的行为体尽快恢复或弥补损失。“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① 其中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主要是尽可能多考虑和排查确定的威胁，将“不确定的不确定性”压缩到最小范围，而“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则是对不确定威胁发生后的平抑控制及事后恢复提出的要求。后者需要发挥安全能力冗余的作用。

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可以降低国家或社会的安全脆弱性。给一个国家或社会造成安全危机的诱发因素（“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是难以悉数捕捉或充分估量的，但国家或社会固有的安全脆弱性却可以通过某些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的方式来改善。例如，预留了充足财政政策空间的国家，在应对或控制经济金融危机带来的波动或震荡时更得心应手。^② 再如，充裕的粮食储备和稳定的供给，对遭遇灾害等外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81页。

② Christina D. Romer and David H. Romer, “Fiscal Space and the Aftermath of Financial Crises: How It Matters and Wh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2019, pp. 239-331.

生冲击的国家维持稳定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①

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不仅对冗余或储备的充足性有要求，对利用的有效性也有要求。美国早在1998年就建立了应对医疗和公共卫生危机及生物恐怖主义的应急医药物资国家战略储备（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但该储备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成效不彰，除储备资金不足之外，不能及时作出加强供应链的决策、与各级政府以及私人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压力测试和应急训练准备不够、物资分发的“最后一公里”不畅通以及和特定私人部门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等，也是重要原因。^②

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并非无限扩大这一冗余的规模，否则就成了追求绝对安全。把握冗余合理规模时需要考虑其成本。在出台相关规定的时候，如果缺乏对安全成本的全面评估，不惜代价追求“不出事”的真实后果，不过是将一种形式的不安全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不安全而已，甚至在转换中还可能出现超额安全损耗。用数字来表示，类似于“为了遏止总量100万元的破坏，消耗了价值200万元的资源”。出现这种情况，背后可能有利益集团的影响存在。对于全社会而言，过度的安全投入得不偿失，但对于具备影响特定领域决策能力的利益集团而言，只要其自身收益高于成本，就会锲而不舍地推动安全投入的增加。此时，有必要由相对中立的第三方对安全能力冗余的成本及潜在威胁作出客观评估。

国家或社会应对不确定安全威胁还特别需要强化国家系统安全投入（BI）。根据式（3）的定义，BI是安全能力投入弹性 ϵ 大于1的投入要素。这类要素的特征是，较少比例的投入增幅，可以带来较大比例的“全系统”安全能力增幅。由于不确定威胁的来源、性质、领域等难以事先获知，那种能够同时在各个或多个领域聚合^③形成安全能力的系统性安全要素，通常能够带来的能力增幅相对更大，也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风险或威胁。

①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第1版。

② Daniel M. Gerstein, *The 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 and COVID-19: Rethinking the Stockpil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0.

③ 聚合与集合不同。安全聚合（security assemblages）过程是那些异质、偶然、不稳定和局部性的要素（并不一定在一致意图作用下，或按照单一逻辑）汇聚成相辅相成的安全合力的过程，而集合（assemblies）是安全要素的偶然、无序或临时性的汇合。参见 Marc G. Doucet, “Global Assemblages of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 10, no. 1, 2016, pp. 116-132; 余潇枫：《非传统战争抑或“非传统占争”？——非传统安全理念3.0解析》，《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3期。

着眼于避免及治理风险综合体，则更需要加强国家系统安全投入。应对和处置安全威胁的领导能力越高、领导机制越顺畅，面对各领域各方面确定或不确定安全威胁时，一国就越能够更快发起回应或适应性行动，并且更能有效动员和组织国际与国内、政府与市场各种资源综合应对。^①具体对中国来说，党的领导，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等指向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安排的制定及顺利运转等相关投入，是最重要的一类系统安全投入。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是确保这类国家系统安全投入得以有效实施的先决条件。

结 语

本文从厘定安全水平、安全能力和安全威胁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出发，形式化定义了积极安全、消极安全、安全困境、系统安全投入、绝对安全、相对安全、有意安全、无意安全、均衡安全等研究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核心概念，并借助这些概念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七个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对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安全具有较为鲜明的政策启示。

第一，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不应以理论已经证明无法企及的“绝对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政策目标。

第二，在开展安全投入时，应该基于对安全威胁及安全成本的合理评估来确定投入水平，不能“不计成本”求安全。在确定特定领域的合理安全投入水平时，应注重利益无涉的第三方评估。

第三，在进行资源分配时，要统筹兼顾发展目标和安全目标。在进行安全能力投入规划和发展成果投入规划时，应真正做到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实现“有相对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最大化。通过改进技术或改善管理等方式来提升产出效率非常重要。无论是提升安全能力的投入产出效率，还是提升发展成果的投入产出效率，都可以增加“有相对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

第四，对那些发展成果产出效率相对较低特别是出现长期下行趋势的霸权国应高度警惕。这样的国家倾向于对外“溢出”安全能力，表现为逼迫一些发展成果产出效率比它高的国家成为向其支付更多“保护费”的安全盟友，并纠集盟友共同“掠夺”另一些发展成果产出效率比它高的国家。

^① 阎学通特别强调政治领导力，认为政治领导力导致国家间相对实力变化并决定国际格局和大国兴衰。参见阎学通：《大国领导力》，李佩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229页；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2页。

第五，应区分国家安全威胁的性质，确定其是否包含主观意图，按无意安全威胁和有意安全威胁分类施策。在实施安全治理时，一方面应避免将无意安全威胁当成有意安全威胁处理，人为制造出“对立面”；另一方面也应避免将有意安全威胁当成无意安全威胁处理，麻痹大意而发生颠覆性风险，还应注意辨别无意安全事件被人利用，制造威胁生出有意安全威胁的复杂现象。

第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将国家之间潜在的敌意逆转为善意，从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大范围内更加一体化地高效配置资源，在新的均衡安全点上，实现更高水平的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产出。

第七，应重视政策空间预留和应急物资储备，为应对冲击及危机后的恢复重建留足安全冗余。一方面要保证相关政策和物资准备的充足性，及时研判形势和更新资源。另一方面要注重相关准备实施的有效性，通过压力测试、实战演练、应急培训等方式锻炼储备应急运用能力。

第八，坚持党的领导和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维护和塑造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安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国家系统安全能力。为持续推进此类能力建设，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赋予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优先地位。

〔责任编辑：张 萍〕

than the simultaneous, of meaning generation and historically effected events that arise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Ausleger* (interpreter). As an event, *Auslegung* is a bridg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etween the unfamiliar and the familiar, and between the foreign and the local; it is an event that is at onc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uslegung*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kinds of action, “long-range” and “short-range;” the short-range is ontological, the long-range methodological.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Auslegung* as a way of existence for *Dasein* is a short-range one, whereas the specific practical problems of *Auslegung* are long-range. The latter includ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uslegung* and meaning, truth, and dialogue, and the limits of *Auslegung*.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se issues? Is the meaning of the *ausgelegt* the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the endowment of the reader, or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itself? Is the truth of *Auslegung* really approachable but never reachable, or is this kind of truth always evolving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In Hegel’s words, is the truth of *Auslegung* the infinity of evil, or the infinity of reality? Does public reason exist? Can consensus be reached? This article proposes som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se questions.

A Theoretical Outlin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for the New Era

Zhang Yuyan and Feng Weijiang • 140 •

China is tasked with attain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facing the global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o this end, it is pressing for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holistic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to provid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scholarly insights. Seven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can be derived when we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curity level, security capacity, and security threats, they are: Absolute security is out of reach; Growing security investment that eyes absolute security will create a security predicament; Under closed conditions, the country should put the brakes on building relative security when it achieves equilibrium security; Under open conditions, hegemonic powers may generate security capabilities that exceed equilibrium security and tend to “protect” or plunder countries whose development has relatively high output efficiency and ones whose security capabilities have relatively low output efficiency; Following separate technologies for dealing with intentional and accidental threats may achieve a higher security level than managing them in the same way; The “Great Yu Improvement” pattern is pivotal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it can transform other actors’ capacity to address intentional threats into a capacity for shielding against accidental threats; And proper allocation of excessive security capability and stronger national systems security capability are major solutions to the uncertain nature of security threats.

Fiscal and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He Dexu and Miao Wenlong • 163 •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